

學術志業與學者養成

鄭伯璦*

學術與學者的本質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提出解答的人雖然不少，但大多是以旁觀者居多；至於身歷其境者則較少，這其中，又應以德國社會學大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919）的回答最為經典。韋伯在其《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的文章中，極有洞見地指出：一方面，學術工作者是精神貴族，能夠享受知性的快樂；但另一方面，學術卻是一種瘋狂的冒險，只有將學術視為個人生命志業的人才能走遠。他的基本論點是：學術探索需要擁有求知求真的精神，能夠耐得住性子，在漫漫長路中探索。路途不但艱難，更不一定保證能有所發現，抵達學術創造的目的地。即使成功了，也因為學術要求超越，所以所建構的理論一定會被推翻，模式也必然過時。在此過程中，還得忍受登龍有術之假權威總是名利雙收或常常超前所帶來的挫折，而需要擁有相當程度的心理調適能力。顯然地，韋伯以其自身的研究體驗，頗為精闢地勾勒出學術研究的本質與學者的天職。可是，由於言簡意賅，我們並不容易瞭解具體的學術探索歷程為何；同時，也因為他已是百年以前的人物，其體驗不見得能夠如實反映當代學術探索的情形。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當代學術工作者的理論建構與學思歷程，曾任美國重要管理學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與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的兩位主編 Ken Smith 與 Michael Hitt 邀請了三十位當代社會科學名家現身說法，希望揭開當代學術研究的神秘面紗。這些學者來自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及組織學等領域，都擁有極為傑出的研究表現，不但建構出新的理論，而且能夠引領風騷，引註次數高達四千次以上。綜合這些名家的經驗，他們在 2005 年出版了一本書：《管理學中的偉大心靈：理論發展的歷程》（*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此書總共二十六章，除了第一章與第二十六章為編者的導讀

*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國科會心理學門召集人



與總結之外，其餘二十四章都是當代學術巨擘的具體經驗。這些學術大師都是當代社會科學的重要推手，諸如心理學的 Albert Bandura、教育學的 Chris Argyris、社會學的 Richard Scott、經濟學的 Oliver Williamson，以及管理學的 Henry Minzberg 等等。在各專章中，他們鋪陳了個人的學思歷程、創構理論的作法與過程、如何深化理論、學術生涯中的良師益友、如何組織團隊進行研究，以及進行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等等，而可對學術研究的具體作法與歷程有一個相當清晰的洞察。

乍看之下，這些學者的經驗與歷練是有個別差異的，不但背景迥異，學思歷程各有不同，甚至在鋪陳個人研究經驗的風格也不一致——即使編者在各章撰寫之前，曾經給予清晰的指引，而顯現了學術之路的歧異、多元及豐富。然而，如果做更仔細的分析與審視，則可發現異中有同，而可看出具理論貢獻之學者的堅持其實是很類似的，他們都是為知識而知識，為創發而創發，而非為五斗米折腰，受制於外在酬賞的誘惑。他們通常探索與開發兼重，所以一方面能夠「大膽假設」，突破當時的理論窠臼，出前人所未發；一方面則亦能「小心求證」，而能將理論做進一步的深化，使之趨於完善。由於與眾不同，所以在建構理論的過程中，大多得承受相當大的主流從眾壓力，但他們卻都能甘之如飴，不為所動。這種不媚俗、不畏壓力的定力，顯然是學術創新的關鍵，卻也是人性的重大考驗。這些學者也確知，他們的成就其實是建立在前人努力所累積的基礎之上，且受惠於良師益友的提攜。因此，都能察納雅言，以開放的心胸來進行批判性的討論，精益求精。換言之，成功學者的堅持與開放是相輔相成的，一切都以求知為依歸。

更具體來說，學術研究的歷程至少包括關注矛盾、探索問題、深化研究及成果發表四大階段 (Smith & Hitt, 2005)。矛盾常常是學者研究的起點，當發現現有理論與實際現象脫節、或是各研究發現之間干格不入時，就開啓了研究之門。矛盾的觀點與發現常常是學者進行探索的動機，用以尋找可能的答案來更新解釋，減少或消除所面對的衝突。Minzberg (2005) 說得好：「只有拋棄研究之『政治正確』，終止信仰權威時，我們的思維才得以像脫韁野馬般地自由馳騁。」

問題的探索應是學術研究過程中最艱難的部分，它是一種創造的藝術，就像馬賽克拼圖一樣，把不同的馬賽克重新剝離，再將所有的碎片拼湊在一起，以形成一幅嶄新的、有意義的圖像，所以這是一種對現存事實的揭露、選擇、重構、結合及綜合的過程。此一過程除了有賴扎實的基礎訓練與豐富

的想像力之外，過人的膽識也是必要的。

當問題經過探索之後，通常會產生新的構念、獲得新的框架，再據此來進行進一步的開發，深化研究發現——嚴謹是此一階段最明顯的特徵。這個過程需要長期而大量的實徵研究，針對理論進行持續性的考察與檢驗，一直到理論完善為止。在研究成果的發表上，創新理論的發表往往是持續奮戰的過程：一開始可能會受到阻礙，因為它破除了典型或流行的觀點，而會受到嚴厲的批判。難怪有些學者認為：過度從眾的人不適合做學術研究，理由是學者所提的構念或創新的發現往往會遭受質疑、誤解、攻訐、諷刺，甚至受到人身攻擊（Bandura，2005）。換言之，學者必須能夠勇者無懼，不怕與眾不同、不怕沒有歸屬、不怕犯錯、不怕權威，更不怕理論被顛覆。不少諾貝爾獎得主在研究早期都曾經歷過出版的困難，其想法也很難被同行接受，但最終不但獲得了認可，而且導致典範革命，帶動了新一波的研究熱潮。也因為如此，有不少人批評在頂級期刊發表的壓力，常常削弱了創新或產生革命性突破的可能，理由是頂級期刊重視量變甚於質變，強調典範內的微調貢獻，往往框限了理論創新的視野（Tsui，2009）。

如果學術研究的本質如此，重視創新與完善、重視關聯（relevance）與嚴謹，則擁有學術熱情顯然是必需的，否則在面對未知的未來與未知的世界時，必然會無所適從。也只有熱情洋溢者，才能在面對失敗時，有所堅持，並養成精雕細琢、為學術而學術的良好紀律與工作習慣。歸結而言，學者的養成乃在培養其對學術的熱愛、對重要問題的提問能力、對現象背後的好奇心、對挑戰權威的膽識，並具備察納雅言的開放心胸。顯然地，以上素質的養成，實有賴於學術制度的配合——制度能夠激勵研究者學會並展現正確的學術作為。

可是，依照當前許多國家的學術制度設計，要想培養真正的學者，恐怕並不容易。以台灣的社會科學而言，現行的制度相當獎勵研究者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尤其是收錄於社會科學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內的期刊；如果是第一流的頂尖期刊，那就再理想不過了。這樣的制度當然有其貢獻，可是，這些期刊都是在美國或英國出版的，自有其偏好，不但反映了其出版的視角，也多著重於北美與西歐的社會科學經驗。尤其不幸的是，為了在這些期刊上成功發表，不少前輩會教導後輩要將期刊所偏愛的議題銘記在心，也要了解議題是否熱門，以免投稿時事倍功半。其黃金定律就是，當主流期刊出現的論文還不到五篇時，表示此問題還不夠熱



門，有曲高和寡的危險；如果超過二十五篇，就表示問題已經被問濫了，引不起編者與讀者的興趣，要退流行了。只有出版十篇論文左右的議題最適合，因為這代表了剛冒出頭的議題，擁有最好的發表機會。這樣的制度顯示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發表論文，尤其是在主流期刊上發表，而非獲得重要的科學發現，或解決重大的實務問題。也因此，閱讀最主流的幾種期刊，選取流行的研究題目、相關理論及研究方法，再去設計研究，才是鯉魚躍龍門的終南捷徑；而關注這個問題是否重要、與當地現象或實務是否有所關聯，則顯然是需要披荊斬棘的泥濘小徑。這種缺失在華人社會頗為普遍，就像跨文化比較心理學家、香港學者梁覺（Leung，2009）所一針見血指出的：「對海峽兩岸三地的學者來說，為了使成功發表的可能性極大化，透過修正西方著名的理論，使之完善，以尋求知識構念的量化增加，並做為研究者的主要貢獻模式，實在是太具有吸引力了！」於是，研究者乃變成期刊及其所屬典範的奴隸，而不是主人。總之，台灣當前的社會科學學術制度鼓勵研究者重視舶來的議題，獎勵對知識創造的微薄貢獻；而間接促成了研究者的急功近利，為發表而做研究，本末倒置。

再以學者養成最重要的博士班來說，當前台灣的制度似乎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首先，在課程設計方面，重視研究方法甚於科學哲學，以至於不瞭解做研究的目的何在，而只在統計方法上大做文章。下焉者則甚至連研究方法、研究設計的課程都付諸闕如，遑論熟悉研究理念。其次，在評估設計方面，重視研究的數量甚於品質，不少博士學程都規定畢業前必須發表數篇 SSCI 與 TSSCI 期刊論文，為了符合這項規定，變項式的研究乃應運而生，一項研究只要更動一個變項，或引入一個新的調節變項等等，即可撰寫論文發表，可是其學術貢獻卻是微不足道的，可有可無。第三，在職涯設計方面，重視職業甚於志業——把學術當成手段，作為牟取名聞利養的工具；而非關注學術探索的終極價值，為求真求知而做研究，重視學「術」甚於學術。以上博士班的種種缺失與改善之道，網絡科學（network science）大家 Duncan Watts（2003）在對其博士生涯進行回顧時，曾有極為精彩的描寫：「略感無聊的導師，加上迷失方向的弟子，很難說是完美的組合，但實際情形卻是如此。博士班那幾年，我與指導教授共同摸索了不少研究計畫，花上跟專業科目數學一樣多的時間討論哲學：什麼問題是有趣的？什麼問題就只是困難而已，沒什麼意思？誰的著作是值得讚賞的，原因何在？與創造力與勇氣相較，純熟的技術有多重要？在進入陌生的領域之前，研究者需要知道多少前

人的成果？這種哲學思考的過程——努力探究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而不只是能做什麼，深深地影響了我日後的研究，於是視野變得開闊！」

顯然地，哲學的思辨是很重要的，否則，學者探討的問題可能是毫無意義的或只是無病呻吟。當博士班的養成教育不夠扎實時，申請計畫、執行研究、發表成果的學術探索之路就會受到阻礙，並且遭遇種種挫折。以研究計畫的申請與成果發表而言，最常見的缺失就是問題的提問不好，缺乏理論貢獻；以及不熟悉社會科學的研究法則，而導致嚴謹性不足。以上兩項問題都涉及博士班的訓練是否扎實，尤其是後者更反映了博士班教育的良窳；至於前者的問題，則除了與教育訓練有關之外，還涉及更多的默會之知，而必須加入研究團隊，與有經驗的優秀學者長期而緊密地合作，才能從這些前輩的皺眉、笑容、竊竊咒罵，以及喃喃驚嘆中逐漸體會（Kanigel，1986）。

總之，雖然學術是一項瘋狂的冒險，理論的提出與完善，非窮數十年之力無法竟其功；而且最終一定會被超越、被顛覆。可是，此路並不孤寂，因為總有不少前輩大師在前面佇佇而行，提供榜樣。尤其重要的是，此路乃是人類文明能夠獲得進展的關鍵途徑，誠如愛因斯坦所言：「沒有創造性來進行獨立思考與判斷，社會的向上發展就像缺乏社群土壤滋養的個人性格發展般地不可思議。」峰高無坦途，所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真正的學者在面對未知時，就只能知難而進，拼命向前！

參考文獻

- 馬克斯·韋伯（1919）：〈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見韋伯著、錢永祥編譯（1991）：《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131-167頁）。台北：遠流。
- Bandura, A. (2005).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K. G. Smith & M. A. Hitt (Eds.),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pp. 9-3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igel, R. (1986). *Apprentice to genius: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dynasty*. New York: Macmillan.
- Leung, K. (2009).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1), 121-130.
- Mintzberg, H. (2005). Developing theor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In K. G. Smith & M. A. Hitt (Eds.),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pp. 355-37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K. G. & Hitt, M. A. (2005). Epilogue: Learning to develop theory from masters. In K. G. Smith & M. A. Hitt (Eds.),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pp. 572-5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ui, A. S. (2009). Editor's introduction – 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1), 1-14.
- Watts, D. J. (2003). *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connected age*. New York: Norton.